

周有光文集

第一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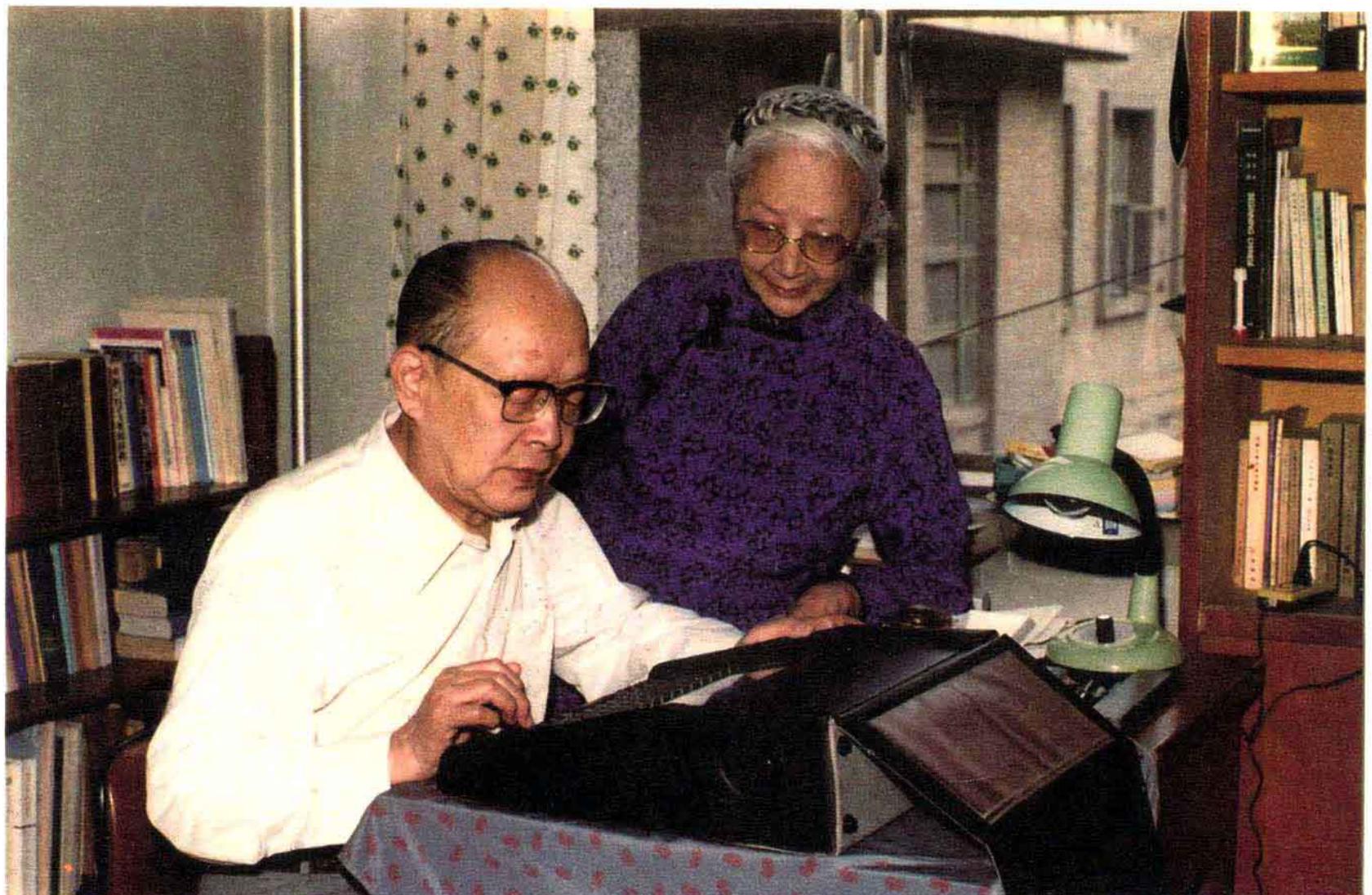
周有光文集
第一卷

汉字改革概论

周有光文集



2013 年生日前夕，作者摄于家中



摄于 1995 年，作者在家中写作

周有光先生手迹

- 高粱研究所以“植物保护处处理学生”地位处理，植物保护处对植物学系学生
很不重视，1951年夏，一种高粱田间害虫害的病害传播到小麦田里，这些害
虫被叫作小麦秆蝇三害，防治工作归秦裕琨、秦振华、吴景衡等技术员负责。冬小麦
上生长的麦秆蝇而得名，当地称“红蜘蛛”，在高粱田部，单株受害率高达90%。最初由于不
发现虫害严重，直到每亩出现“小麦秆蝇危害麦苗”时，由于小麦茎秆红油
行的命令，抓紧防治，通过防治和因时制宜的组织办法，于7月10日防治结束。
“小麦秆蝇防治工作取得初步胜利”，防治方法值得肯定。

- ① 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建国初期“三步走”的战略
② (总论) 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④ (1978年)
⑤ ① 1970.9.6. 毛泽东的“批极左路线”讲话(“四五运动”背景)
② 邓小平、毛泽东《新修订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序言(“文革”期间)
(因为毛泽东已经于1976年华山去世) ③ “四五运动”讲话
④ 华盛顿共识(美国政策)

(6-7=0)
1970.9.6. 《人民日报》刊王光英“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
及周总理、董耀林《新阶段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纲要》的讲话
(即《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改革纲要》)的纪念讲话。
华罗庚等数学家的讲话。

6

毛主席“华文教学的注意问题”，1956。帮助研究
双音多义词的辨析，帮助注释的修改。

- 一、通鑑與《資治通鑑》的異同：
—《通鑑》是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是編年體，但不是通鑑。兩者在行文上都有過渡和題記，這就是個別，總體是相同的。
—在後面，李氏開國之初，有齊梁宋陳，也有南齊、南梁、南晉、南唐、南漢、南唐、南宋等，這些都是不應該出現的。
—周易中說：「周易之謂通鑑」，就是指《通鑑》能統一各朝代的歷史，就是「通鑑」的意思。
—《通鑑》的編寫方法是：先列年表，再列各朝代的相關事件，再列各朝代的相關事件，再列各朝代的相關事件，以此類推。
—《通鑑》的編寫方法是：先列年表，再列各朝代的相關事件，再列各朝代的相關事件，再列各朝代的相關事件，以此類推。
 - 二、通鑑與資治通鑑：(總述)(總評)、(卷首)、(卷尾)。
—《通鑑》的卷首：「資治通鑑」，「資治」二字是皇帝對「通鑑」的評價，「通鑑」是皇帝對「通鑑」的一個總評；「資治」是皇帝對「通鑑」的總評。
—《通鑑》的卷尾：「通鑑」二字是皇帝對「通鑑」的一個總評；「資治」是皇帝對「通鑑」的總評。

《周有光文集》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 柳斌

委 员 (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陈光磊 陈章太 费锦昌 冯志伟 李乐毅
罗一民 马庆株 苏培成 阎立 姚喜双
袁钟瑞 张森根 张世平

编辑顾问 吴彬 孙晓林

编辑小组 薛晓源 (组长)

叶芳 (副组长)

王忠波 侯天保 隋丹

《周有光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周有光先生的家乡江苏省委统战部、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的鼎力支持，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常州市文广新局等部门也给予了具体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周有光文集》出版说明

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史专家，精通英语、法语、日语等多种语言，也是迄今仍在从事学术工作的最高寿学者。寿过期颐以后，周有光先生仍然保有强烈的探索人类发展基本规律和当代科学技术新知识的浓厚兴趣，笔耕不辍，成果迭出，其学术声望超越国界，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有光文集》凡十五卷，五百余万字，收录了迄今已公开发表的学术专著、随笔杂文等作品。第一至第八卷主要是语言学、文字学、文字改革研究以及与中国语文现代化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第九至第十五卷包含周有光先生最近二十年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及著作，其研究方向侧重于文化史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其中有些作品为散文、随笔和杂文。各卷前均有“本卷编辑说明”，提示各卷与原作品之关联和具体变动情况，以交代每一卷作品的版本来源、版本流传、编排情况、大致写作时间及与其他卷次的参见关系等。

全书以作者已出版三十余部专著或文集（个别为旧作重编的文集除外）为主体，按文类、主题、写作或出版时间顺序递

次编排。如文集之间所收篇目有重复，则视具体编排或出版时间先后完整收录一处，其余重复篇目加编者注或存目，置于本卷最后，读者可对应了解或找到这些篇目的所在卷次或页码。

全书尽量保持作者发表或出版时的写作习惯和风格，一些用语、标点和译名等不根据现有标准强行统一，除有明显排版错讹外，一般不作更动。

《周有光文集》各卷中包含的大量统计数据及资料，与作者写作年代当时的事实在有关，读者阅读时可留意作者具体写作年代。

《周有光文集》的出版得到了作者的授权，作者为文集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作品目录和亲自修订的文稿，对文集的选目、编撰、取舍等给予了详细、清晰的指导意见。根据他的意见，文集不收入作者早期关于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论述以及书信等文字。

遵循专家意见，编辑小组在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等卷次后编制了索引，索引主要涉及人名、地名、专业术语、重要主题词等。

在编辑《周有光文集》过程中，除得到周有光先生的直接指导外，其中涉及的关键性问题我们还经常求教于苏培成先生、张森根先生等学者，同时在编辑工作中得到了业界资深编辑吴彬、孙晓林等人的具体指点和教导。尤其是周有光先生家属提供了所有文集编辑工作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料和原版样书，对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尽可能多的便利。此外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常州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及相关领导均在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实质

性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周有光文集》出版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囿于编辑自身的知识局限以及编辑工作进行的时间较短，《周有光文集》中许多编辑问题可能未及发现和纠正，恳请作者本人和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4月15日

《周有光文集》导读

——浅谈周有光先生的学术成就

苏培成

一、周有光先生生平简介

周有光先生本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经济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上海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业余时间参加拉丁化运动。1949年6月回到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同时担任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第二业务处副处长；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先生的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十分宽广。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

全面的科学的阐释。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半个多世纪来，周有光先生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四、五、六届委员；还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编审、《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顾问、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等。20世纪50年代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

二、周有光先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

周有光先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核心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如何建设新时期的中国新语文。周先生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中国，从中国看中国许多问题不容易看清。周先生从世界语文生活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一纵一横两个坐标看中国的语文问题。在纵的方面，他研究了人类语文生活的历史进程；在横的方面他研究了世界许多国家建设新语文的成就和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深入分析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周先生不但从事理论探索，而且密切关注社会语文生活，积极参与新语文建设的多项具体工作。其中重

要的有以下四项，就是：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

（一）揭示人类语文生活的历史进程

人类的语文应用构成了人类的语文生活。周先生告诉我们，在农业化时代人类创造并传播了文字。在工业化时代语言生活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确立和普及国家共同语，另一件是发明、发展和推广传声技术。“二战”以后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的语言生活有两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电子计算机用于处理语言文字，并发展为信息网络；另一件是国际共同语的发展。文字、国家共同语、传声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国际共同语，这就是 5000 年来人类语言生活里先后出现的五件大事，可以叫做五座里程碑。语言生活的这五个里程碑不是跨过一个结束一个，而是个个都延续发展，同时并用。从 5000 年前看今天，人类的语言生活已经达到“上穷碧落、下及黄泉”的神话境界。可是，历史永远不会停止，还在更快地前进。当前，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推进信息化，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追赶工业化和信息化。

（二）研究世界各国的语文新发展

周先生说：“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的语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的语文新发展，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经常课题。中国应当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根据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语文政策。

周先生说：100 多个新兴国家，独立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规定国家的共同语，作为行政和教育的工具。文明古国都有

历史悠久的语文。到了信息化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为了减少语文的学习困难和增进语文的学习效率，都进行了各自不同的语文更新。周先生还告诉我们：新语言需要写成新文字。采用哪种字母书写新文字，成为重要的抉择。“二战”之后，掀起一个拉丁化的新浪潮。所有新创的文字，无一例外地都采用拉丁字母。有些旧文字也改用拉丁字母。不用拉丁字母的文字，也规定了拉丁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作为技术符号，在国际互联网络上使用。一个“书同字母”的时代正在悄悄形成。

在研究世界各国语文新发展的时候，周先生还特别阐明了两个十分重要问题。第一，现代是双语言时代。“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在语言工作上，它们面对两项任务：一方面要建设国家共同语，另一方面要使用国际共同语。日常生活和本国文化用国家共同语，国际事务和现代文化用国际共同语。文化和发达的国家，早已实行了双语言。中国的双语言原来是指推广普通话：从只会说方言，到又会说普通话。这是“国内双语言”。现在又有了第二种含义：从只会说普通话，到又会说英语，这是“国际双语言”。从双语言的水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测知国家现代化的程度。第二，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是国际政治、贸易、科技和旅游的主要用语，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外国语。它不仅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家的疆界。今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如果不能进入国际竞争，就有落后和失败的危险。要想进入国际竞争，在语言上需要学习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英语是一条大家可走的世界公路，谁利用它，谁就得到方便。

(三) 把语文现代化和语言学挂钩，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自清末开始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到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它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学术水平还有待提高。在这个时候，周先生把语文现代化和语言学挂钩，科学地回答了语文现代化里面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语文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周先生告诉我们：语文现代化是一件世界性的大事，不是某一国所特有的问题。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前；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生急剧变化。秦并六国，发生“书同文”变革。辛亥革命，发生白话文和国语运动。100 多年来，中国语文现代化内容逐步发展，前后包括：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汉字的简便化、注音的字母化、语文的电脑化、术语的国际化。主要的是前四化。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紧跟瞬息万变的历史步伐，向信息化时代前进。

学习周先生的论著使我们认识到，100 多年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改变了我国人民的语文生活。在清末，我国民众的语文生活十分落后，特点是方言加文言文，汉字繁难，文盲众多。经过 100 多年的语文改革，落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前的特点是普通话加现代白话文，汉字经过简化和整理，繁难程度有所降低，而且有了辅助汉字的汉语拼音。我们每个人都是语文现代化的受益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 100 多年来语文现代化的成就，指导我们的语

文生活沿着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道路前进。

（四）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领导研制《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汉语需要表音字母，研制一套科学实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始终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2月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负责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周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为《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制订拼音方案首先要解决的是采用什么样的字母。新中国建国初期，知识界——包括语言文字学界，对世界字母的情况所知不多。周先生为了给选择字母提供参考资料，编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书。周先生在书中告诉我们：拉丁字母是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共同工具。在文字的结构上，它是最进步的音素（音位）制度；在字母的形体上，它是最简明实用的符号；在语音的表示上，它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它有这些优点，所以它能够活跃地生活在日益众多的民族中间。拼音方案委员会起初采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设计方案未能成功，最终采用了拉丁字母，历史证明这是完全正确。这个选择固然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远见，而周先生的推荐介绍也是功不可没。拼音方案既然采用了拉丁字母，就必须采用音素制的音节结构，而不应该采用双拼制（如反切）或三拼制（如注音字母）。既然采用了拉丁字母，在字母和音素的配合上，就必须遵守使用拉丁字母的国际习惯。但是拉丁字母毕竟是外国字母，让它和汉语音素相配合，其中就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要处理。周先